



Reconstructing the Way of the Teacher - A Study of Zhang Shi's 'Preaching to the People'

Jiji Chen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Email address:

yoko@hnu.edu.cn

To cite this article:

Jiji Chen. Reconstructing the Way of the Teacher - A Study of Zhang Shi's 'Preaching to the People'. *Science Innovation*.

Vol. 11, No. 3, 2023, pp. 126-131. doi: 10.11648/j.si.20231103.15

Received: May 6, 2023; **Accepted:** May 22, 2023; **Published:** May 29, 2023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ZhangShi used the concept of "preaching the Way to the people" to reconstruct the concept of the Way of the Teach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Way of the Teacher has always been viewed as the central concept of education, but ZhangShi's emphasis on "getting the king to do the Wa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scholar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is study analyzes ZhangShi's reasons for reconstructing the Way of the Teacher, which includes his concerns regarding the real-life situations of the people and the impact of the Hu Xiang School lineage on the scholarly culture. This is done to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ZhangShi's promotion of Confucian and Mencian teachings. Moreover,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ore tenet of the Way of the Teacher: "getting the king to do the Way." Additionally, it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clarity and self-restraint, benefit to the people, and benevolent standing and righteous conduct. This paper also outlines the crucial aspects of the Way of the Teacher, which includ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learning and order, and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Lastl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Way of the Teacher, which aims to establish a good socio-political order.

Keywords: Preaching to the People, Education, Confucianism, Politics

师道的重建-张栻的“传道济民”研究

陈计吉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长沙, 中国

邮箱

yoko@hnu.edu.cn

摘要: 本论文旨在探讨张栻如何以“传道济民”的思想来重建师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师道一直被视为教育的中心观念, 但张栻的师道观念的侧重点在于“得君行道”, 与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本文分析了张栻重建师道的缘由, 在于其对现实民生的考量, 以及对士大夫学风的担忧和受湖湘学脉的影响, 以揭示张栻弘扬孔孟之学的重要性。其次, 重点探讨师道的核心思想, 即得君行道。并对明理克己、利民、仁立义行进行了分析。并对师道的关键要义: 义利之辨、学而有为、知行合一进行梳理。最后, 本文讨论了师道的目的, 旨在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

关键词: 传道济民, 教育, 儒家, 政治

1. 引言

张栻的“传道济民”思想融合了教化人民、得君行道和发扬孔孟之学等理念。作为湖湘学派的领袖，张栻曾在岳麓书院讲授经典，并强调：“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这表明了他对培养人才和弘扬教化的重视。他想要改变社会风气的思想，也与宋代较明代更为开明的政治处境有关。张栻注重实践和民生，将理论与实际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知识需自觉转化为行动和实践，并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他的“传道济民”思想不仅仅是论述天理，更侧重于借助儒家经典引导人们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满足人民需求。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张栻修道立教的缘由，以揭示出张栻对重建道统、政统和学统的重视，从而得出，张栻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对传统儒家思想继承，更强调注重实践、面向社会和人民生活问题的思考，通过教育和文化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也对当今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2. 重建师道的缘由

每个时代的社会状况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挑战，张栻所处的时代是南宋时期，社会动荡，人民苦难，这促使他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他认为“传道”即讲授经义，可以引导人们正确道德价值观，并使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谐；而“济民”即关心民生，关注人民的疾苦，通过教育改善人民的生活。

2.1. 现实民生的考量

南宋时期，张栻生于四川绵竹，八岁随其父张浚至湖南长沙。张栻在《答陈平甫》的信件中谈到：“某自幼侍亲来南，周旋三十年间，又且扶守坟墓于衡山之下，是以难为蜀人”[1]。对长沙了解颇深的张栻，曾言当地“无一事不当整顿”，并叹“此路民贫尤甚它处，田多未垦，茅苇弥望”[2]。当地的义勇民兵虽体格强壮，却数年不教。张栻感叹于当地文教缺乏，由此发出感慨“一境之民，得蒙被诗书之泽，何其幸哉！”

同样，《谕俗文》中，张栻谈到在任职静江军府时乡土社会中，因教化不及所导致的风俗不美事件，大致有：百姓无知，遇灾病等事，听信师巫的邪说；百姓无知，丧葬礼仪不遵循法度；婚姻奢靡，生子多而不教；百姓无知，病不服药；以及诱妻贩人等事。同样，在《黄鹤楼说》中，张栻也提到世俗之好怪，大多源于不明理之故，异端之惑人更胜。因此，改善民俗、教化百姓刻不容缓。张栻认同汉儒所言，明于天地之性，知晓万物之情才不会惑于神怪，罔以非类。

张栻对民生的重视既体现于对教化的重视，也心系百姓的食不果腹。他曾见黎民百姓丰收欢呼，妇人忙碌，稚童雀跃。于是作《道旁见获者》，既喜于“幸此岁不恶”，感慨百姓于“姑宽目前饥”，又体会到“书生独多忧，何以救民瘼”。也曾在《七月旦日晚登湘南楼》中提到“民瘼未渠补，况敢怀乐康”。这与张栻在《山斋二首》中写到“怀哉千载心”一样，都展现出张栻内心对民生的关怀。此外，

张栻还曾于衡山为振民而不畏获罪。认为在荒年之间，对百姓的救济不仅是精神上的改善，更重要的还有“振济也，振灾也”。对饥苦的百姓需官中捐米以救之，而官员们吝惜粮食而不愿意救助。并且曾劝说陈帅救济农民，奏闻且待罪，坦言“比至获罪，而十数万生齿已活矣，况未必获罪耶”[3]。由此看出张栻的仁义之心，他既怜惜南宋内忧外患的政局中，百姓的生活艰苦，感慨于百姓的无知，也产生对民生教化的迫切需求。

2.2. 圣学失传

张栻重塑师道的第二个根源在于，儒家道统因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而出现危机，张栻主张复兴道统[4]和排斥异端。南宋学士大夫们的诸多学术弊端主要体现为：不知尊孔孟而诵六经、泥传注且溺文辞、忘实、怀利心等诸多问题。举例如下：

其一，孔孟之学失传与异端之学兴起。如，《南剑州尤溪县学传心阁铭》中，张栻提到：“圣学失传，历世久远，其间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诵六经”。在《敬斋记》中，又提到，因为孟氏没，圣学失传，在千数百载间，学士大夫们的求道之路，都在“泥传注，溺文辞，又不幸而高明汨于异说，终莫知其所止”。对此，张栻感叹到：“今日大患，是不悦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严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为迂阔迟钝之说”。

又在《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中，张栻谈到，秦汉以来的为政者都沉迷于功利之习，求道的人又沦陷于异端的空虚言论。《送曾裘父序》中，张栻写到“予念世衰，共学者鲜，天资秀美之士往往为他歧所陷溺而不反”，他感慨于世事悲哀，志同道合之人偏少，有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常沉迷于名利和误入歧途，无法自拔。

其次，“忘实”与“怀利心”。在《与施蕲州（少路）》一文中，张栻认为今日人才之病，在于“其号为安静者则一切不为，而其欲为者则又大抵先怀利心”。人们太过怀念功利，而忽视了儒家思想与保民之心的重要性。除学士大夫们常怀利心之外，张栻提出了“忘实”。在《寄周子重商书》中，张栻提到“重谕近世学者徇名忘实治病，此实区区所忧者”，现代学者追求名利，而忽视了实。由此，展现出修道立教的必要性。正如，张栻在《雷州学记》指出：“师以导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趋日入于善，而自远于利”。

2.3. 湖湘学脉的影响

张栻重视师道的第三点的缘由，在于受湖湘学派的影响。以道统的宏大叙事为背景，理学家们虽都以复兴儒学道统为己任，但都各行其道，建立自己的理学学统体系。因此张栻为了继承宋代初期儒学的主流，改变现状，以重塑回归传承儒家道统和推动理学的学统的成为了张栻整体思想的核心。早在宋太祖时期，就相传立有“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誓言[5]，因此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涯比明代要宽阔的多。在道统的宏大叙事中，由于孔、孟不传之学，为了继承宋代初期儒学的主流，改变现状，重构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从而，师道成为了张栻思想的核心。

张栻对民生和学士大夫们的忧虑, 以及其“修道立教”的思想基于北宋诸子思想传承, 源于孔孟精神的继承, 也颇受胡安国和程颐的影响, 张栻把胡氏夫子开创的湖湘学派推至鼎盛[6]。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 张栻在碧泉书院拜胡宏为师。胡宏曾言: “学圣人之道, 得其体必得其用, 有体而无用, 与异端何异”[7]。胡安国在《与子寅书》中, 谈到“立志以明道”和“深求所以牧民共理之意”的思想, 皆展现出其对儒家伦理中“正人心”、“道”和“民”的重视。胡安国的著书和思想流传千古, 其子侄和所教的弟子皆成一代名儒。张栻曾为胡宪的《知言》作《胡子知言序》, 而“经世致用”与“传道济民”的思想在胡宪的《知言》中就有所体现, 胡宏的实践思想在张栻的传道济民思想中得到继承。

总之, 张栻对南宋时期的圣学失传问题有深刻的认识 and 批评, 认为学士大夫们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不注重孔孟之道, 沉迷于泥古注辞, 没有实际的应用, 怀有利欲之心等。这种情况导致宋代的学子们在求学之路中迷失方向, 陷入空洞的异端之中, 也不利于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的稳定。他能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 并提出“修道立教”的解决方案, 是基于北宋诸子思想的传承和胡安国的影响。在胡宏的指导下, 张栻强调学习圣人之道要注重实用, 将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 用以维护社会中的正义和道德; 他注重“经世致用”, 通过实践去推动社会的改善和学风的改良。

3. 师道的核心: 得君行道

宋明理学家是借助佛道的思想资源, 对儒学进行改造, 并且将人间的政治秩序与天道相结合。湖湘学派认为君主是天命之主, 拥有至高的地位。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 余英时谈到宋明理学对师道的重视, 提倡“修心养性”的施教对象是士, 而非一般的民众。[8]与佛学中的普度众生不同, 理学家们将传道的对象寻求于士的阶层。张栻同样关注为政者或士大夫的教育, 侧重于“得君行道”的教育路线, 旨在君主共同治理天下。

张栻得君行道的思想在于对朝政现实的考量, 在《南轩先生文集卷第十六》的《张子房平生出处》中, 张栻曾言: “嗟乎! 秦汉以来, 士贱君肆, 正以在下者急于爵禄, 而上之人持此以为真足以骄天下之士故也”。他担忧“士贱君肆”的危机。并且, 出自对“民不知轻重”, 需要“圣人为权衡以界之”的考量。张栻认为君王需要拥有管理和引导百姓的作用, 在权衡利弊后为百姓作出抉择。因此, 以下细分了张栻认为君王需要具备明理克己、有利民之心、以仁治国、注重教育等品性。

3.1. 明理克己

确立师道不仅有助于士大夫们重新重视孔孟之学, 也有助于天下百姓。因为, 张栻曾提出“惟民之生, 厥有常性, 而不能以自达, 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也就是说, 百姓需要依赖于圣贤者为其开道明路, 而这需要师道的确立。在《三先生祠记》中, 张栻也认为: “师道立则善人多, 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 表明善人多的根本在于师道的确立, 而治理天下则需要善人多。

《论语》中提到“君子之道”在于: “行己恭, 谨重而不悔也; 事上敬, 忠实而不欺也; 养民惠, 以慈爱涵养之也; 使民义, 役之以时, 用之无私也”, 而张栻“传道济民”也是对“君子之道”的具体表现。对于圣贤者而言, 明道之路也并非易事, 需要以“明天理”和“克己”为为政的基本需求, 才能实践“传道济民”。

张栻的“克己”和“明理”源自《大学》的正心之道, 它们具有对自身的约束和治理国家理论的作用。在《诗葛覃》中, 张栻谈到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治国之人应有着对自身的约束, 居安思危才能造福百姓。

张栻的师道思想强调了为政者与士大夫的道德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 对中国古代教育与政治伦理产生了深渊影响, 也为治理国家和君主的修身之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2. 利民

张栻以君主和士大夫作为施教的对象不能曲解为对民的忽视。他认为为政者对百姓的关心, 了解百姓尤为重要。在《潭州重修左右司理院记》中, 周国衰亡, 张栻认为是因为“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因此, 除了为政者的“克己”之外, 张栻还认为君主应心系黎民百姓的生活, 以得民心。应同祖宗一般“自家刑国之懿, 下斥今日兴利扰民之害”[9]。在《经筵讲议》中, 张栻详细谈到实王业的根本在于合理的分工, 并以周家建国为例子, 探讨周以农事为本, 君子重稼穡, 家室躬纺织, 互相体谅劳苦。知晓农事艰难的君王会端正其心, 知百姓所愿; 而懂得织纴的后妃也会心有所依。[10] 只有对百姓的事知晓入微, 为政者从而才能思天下之饥寒, 严恭朝夕且不会懈怠。

3.3. 仁立义行

在《孟子·离娄上》中写道: “尧、舜之道, 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宋朝的儒家士大夫非常重视“仁政”的理念。程颢在《上仁宗皇帝书》中引用了孟子有关“仁政”的话, 而王安石也在《临川集》中引用了这段话, 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同样, 张栻也对仁与君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汉家杂伯》中, 张栻谈到: “夫惟王者之政, 其心本乎天理, 建立人纪, 施于万事, 仁立义行, 而无偏僻不举之处, 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 而垂裕乎无疆者。”为政者的君王之道需遵循天理, 广施天下, 尊崇仁义, 没有偏袒和不公的行为, 才能长期的治国安邦, 这也是古人治理国家并且能长久统治的根本。

首先, “仁”与德的关系。在张栻所著《南轩易说卷三》中, 他区分了“天道”、“人道”与“地道”, 并强调了“仁与义”在“人道”中的重要性。他认为, 人类内在的道德需求“仁与义”应成为师道的核心。同时, 他认为“天道”是万物有自然之理的存在, “人道”的道德修养应在于自身。他认为, 道者出于天, 德者得于己, 正因如此, 张栻非常强调“仁”的意义及其在道德中的重要性。[11]他将“性”划分为“四德”, 其中“仁、义、礼、智”的“仁”也属于“德”的一部分。在张栻的思想中, 他认可世人可以通过对圣学的学习来接近“天道”。他同时认为, “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端”表现出道德的最终实践。张栻认为, 仁是天下之正理, 也

是做王的仁德。他通过孟子与齐宣王交谈的例子展示了齐宣王对杀牛的恻隐之心，进而阐述了齐宣王具有做王的仁德。

其次，君王应成为师道的榜样，言行身教，成为百姓效仿的模范。如同张栻在《江陵府松滋县学记》中所说：“则夫风声气俗之所及，闾里小民亦将视效而知劝，畏威而寡罪，乐趋于淳厚之习”，那些言行广泛流传的话语、形态举止会影响乡里小民，因而明白善恶，敬畏威严，减少犯罪，养成趋于纯厚的习性。君子还应该培养“养民之心”，让人民因为耻恶做恶而自觉自律，并以建立师道最终促进社会风气正派、人人善良。这也能够减少犯罪率，因为人们敬畏威严。

最终，张栻对教化百姓的期望为：“最终使之无讼者，其必有道矣”。也在《潭州重修左右司理院记》中，张栻所言：“明教化之端，以期无讼之本”。而君王应该像南康守一样，“先王发政施仁之实，圣人天理人伦之教，莫克推寻而讲明之”。转言之，张栻认为君王应该先有正确的学问，努力践行，施行仁道，明圣人之理。

以上从“克己”到“利民”之道，无非也是希望“以济民行使天下之人咸知其是非厉害得失”。对君王而言，也会因“克己”而“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其方法也在于“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岂有他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然其所施有先后，则其缓急不可以不详；所务有名实，则其取舍不可以不审，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也就是说，对待百姓，物质上应该不消耗百姓的人力和财力。思想上，应该让百姓明白大义，正视自身心态。张栻曾在淳熙四年二月作诗“惟天之心，矜我下民。民不惟天，使尔有成”，以示父老。张栻认为“嗟尔农民，各敬乃事”，百姓也应不懈努力耕作，勤于自己的工作，铭记本分。

这便是君王以“克己”修身，以“仁”治国，最终“得民心”，“使民义”的过程，也体现出张栻的济民思想中的“以爱养之，用之无私”的待民与教民理念。

4. 师道的要义

张栻“传道济民”的师道思想对中国古代教育和政治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呼吁通过“修道立教，以觉来今”[12]的方法来重塑师道。他认为，为政者应以“仁政”为根本，为正理。为人，应明晰义利之辨。为学，应当学而有序。在其师道思想中，他主张以仁义为核心，在教化中加以实践。这一师道理念既是关于教育的，也是关于政治伦理秩序的考量。张栻的师道思想既代表了宋代教化思想的传承路线，又是一种革新。这体现了张栻的教育方法和思想，也传递了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

4.1. 义利之辨

通过“天理”与“人欲”的区分，得出应“本心之当为”，也就是所为之事应出自本心。张栻的义利观，来展现“所为”的目的在于：“为己”或“为人”？

其一，张栻的“天理”与“人欲”有本质上的区分。他提出“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旨在强调“天理”应该

在于“本心之当为”，而非在于人欲的驱动。张栻认为“天理”是应当被追求和实践的，并“人欲”应被抑制或受到约束。这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孟子在战国横流时，认为发挥天理，并遏制人欲才是道义。张栻引用孟子的观念，认为“莫乎天理之所存”，并感叹道“微孟子，其孰能发挥之？”。

其次，“义利之辨”是学习孔孟的首要。《送方耕道序》中，张栻提到“义”与“利的关系：“嗟乎！道二，义与利而已矣。义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途；而利者犯荆棘、入险阻之私径也”。这里可以看出，张栻认为“义”属于正理，而“利”属于私欲。他认为，“为人者，无适而非利；为己者，无适而非义。”由此，可以看到张栻思想中“义”即“为人”，“利”即“为己”的逻辑关系。

其三，“义利之辨”与自身的局限性。他也提出“曰利，虽在己之事，亦为人也；曰义，则施诸人者，亦莫非为己也”[13]。从而，他感叹“义利之辨大矣，岂特学者治己之所当先，施之天下国家一也。”在《静江府学记》中，张栻发问：“某惟古人之所从事于学者，其果何所为而然哉？”并自答到，人生出来就有常性，立于天地间则有常事，学习在于明辨万事而承担天职位。因此，可以看出，在张栻看来，明晰天理非常重要，尊重自身的职责也同样重要。

最后，张栻区分了“无所为而然”与“有所为而然”。提出“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14]。也就是说，“无所为而然”的境界就是达到“本心之当为”，这是天理，也是正理。然而，“有所为而然”则是属于“人欲”，也是属于“利”而为。关键出发点在于“所为”的目的是“为己”还是“为人”。

从孔子、孟子、荀子到后来的新儒家思想，都蕴含着“为己”或“为人”的思想之辨。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而荀子的观点却与之不同。荀子主张“为己之学”既是自我德性完善的“君子之学”，而“为他之学”则是庸俗的“小人之学”。他们主张“为己”并非在于外在功名利禄，而是指向自我的德性的完善和人格的健全。

4.2. 学而有序

张栻在《答魏元履》中提到，“天理之难明，人心之难定，而讲学之不可一日忘也。”他认为，只有以孔孟为宗，建立师道，才能“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也因，在《答直夫》中，张栻谈到“天理微妙而难明，人欲汹涌而易起”。明理传道的启蒙之路并不容易，需“学而有序”。

在《答刘宰》中，张栻指出当时学者的问题在于“未循其序，遽欲识大体，则是先求获之心”，急于求全，没有脚踏实地，以利之心求学，只是想象摸量，最终也没能得到实质的进展。圣人的教导也告诫后人要警惕心急，要借鉴前人的经验，需“居敬穷理功夫日积月累”才行。

在《答李季修》时，张栻也谈到论学之难，若是以“己意悬断，则失之远矣”，如果学习心志不坚定，徒有自己的想法，是难以成功的。只有经历了长时间的坚持，才能通达真理。同时，他提到在讲授学问时，要以孟子的思想

为基础,结合程颐的观点,“以集义为本,以居敬为先”。学者应遵循孟子和程颐的思想,朝夕勉学,循循不已。

张栻还指出也提出君子与圣人之间有所差距的,“道虽不远人,而其至则圣人亦有所不能。虽圣人有所不能,而实亦不远于人,故君子只于言行上笃实做工夫,此乃实下手处。”转言之,君子应在言行上下功夫,才能做好实事实。

4.3. 知行合一

张栻的师道不仅是提倡学习孔孟之道,也是对儒家关于“人道”之学的延续[15],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实际中的应用,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知行合一”的目标。

首先,缺乏实践的“妄人”。在张栻的“传道济民”思想中,知识通过传承和应用,也就是“济”,成为行动的基础。他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在《南轩先生论语解》中有所体现,以孔子的“知之立行”为根本,张栻认为,当时学者“求所谓知,而於躬行则忽焉”,唯求知而不注重行动,导致实践经验的缺乏,这样的人被称为“妄人”。只有学以致用,投身实践之中,才能知我所知。要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是“知行合一”的目标。通过日常的反思和想象,以及实践实现,“知行合一”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实践。在《答江文叔》中,张栻谈到“格物致知”理念的最高状态就是“至极其理”。只有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把“格物致知”落实化,才能最终实现“知行合一”。

其次,“仁”为“知”与“行”的纽带。周允升曾对《通书》中所言提出疑问,他问到:“德爱曰仁,仁是性,爱出于情。而《语录》中也提到‘力行近乎仁’,”便问张栻:“力行关爱甚事?”张栻作出了回应,他认可了力行近乎仁,虽不能只将爱作为仁,但爱的理念是与一样的。

其三,“知行合一”的尺度。范伯崇曾言:“知之行之此二者,学者始终之事,阙一不可。然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也。”张栻认为,范伯崇等人的思想“意皆未究”,因为知者有凡、圣之分,不可同日而语。张栻在回答吴德夫疑问时谈到,凡人只能受感物所动,在不知的情况下而践行。只有贤人,这里包括了君子、君王和圣人,能够在知行之中从容,与天地相连接,具有致理之道,圣人的动容周旋都有着至理。[16]因此,他认为知不艰难的人是已经具有良好品行和学识之人,这类人既是知,也身亲实践,所为“知之者言也”。但常人也需“知行合一”,只有“知之而行,则譬如皎日当空,脚踏实地,步步相应”,而反观“未知而行者,如暗中摸索。虽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17]只有知行同步,才能“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远”。

最后,“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在《寄周子充尚书》中,张栻也提到“盖致知力行,此两者工夫互相发也。”也就是说,“知”与“行”能相互促进,才能“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几所践之实而思虑之开朗”。因此,对于儒家理论的理解和实践,张栻认为知行合一是非常重要的。

5. 师道的目的:创建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

宋代士阶层既是文化主体,又是一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主体,其在政治上的主动性是凸出的,既超过了之前的汉与

唐,也超过了之后的元、明、清[18]。赵宋王朝对于士大夫特别的优礼,士大夫们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在北宋儒家就提出要在政治层面与皇帝同治天下,重建人间秩序的思想。张栻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且心系民生的士大夫对于教育改革也给予厚望。

张栻的师道的重建之路,是以君王和士大夫的“克己”到“利民”的修养到成为民众的榜样,并最终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此,他的教育理念体现出的是对从政者后天的教育与社会治理、国家兴衰息息相关。他认为,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正确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指导,而师道恰恰扮演了这个重要的角色。立师道不仅是一时的益处,重建人间秩序是道学的中心任务[19]。它还能通过传承给子孙后代,让其所传所著的思想能够影响天下,兼善万世。正如张栻所言:“天道在人,夫子若尧、舜、文、武、周公施之,则能流传于天下;然若著之于六经,传于门人,亦能兼善万世,天道流行盖无穷矣。”[20]。

此外,张栻的济民思想和救世情怀也脱离不了时局的影响,面对疆土沦丧,他在朝政中主张抗金和收复中原之地。济民思想需要有“救世”的情怀,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动荡就激发了诸子百家的“救世”情怀,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大多被广泛认为缘于“救世”。朱熹曾赞杨张栻:“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21]。张栻的抗金思想也是其“践履”的表现。张栻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并进言孝宗“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22]张栻认为圣上对国耻与百姓福祉的担忧解读为天理存在的一种表现,并认为君主应亲贤能,勤勉少歇息,那么收付中原就能成功。张栻的救世情怀对后世也影响深远,在《宋元学案》中,记载着三十三人,称为“岳麓诸儒”,从淳熙到嘉定年间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其中诸多儒臣征战的典故。而《宋元学案·元城学案》更有对张栻的救世教学精神影响的记载,“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惜其莫可考见。”宋末景炎二年(1277),张栻曾孙张唐,也与赵璠、张虎等人在邵阳、永州等地做抗元斗争[23]。

6. 结论

岳麓书院作为传承孔孟思想和倡导实学的重要载体,承载了传道济民的思想,其中张栻的教育思想对岳麓书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造了一个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社会学习和知识传播的体系。虽然岳麓书院与今日的教育机构已经有所不同,但其所弘扬的教育价值观与理念却仍然值得保留和借鉴。张栻所提倡的“传道济民”思想不仅依附于仁义之心,而且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他主张修道立教,将教育和治国理民相结合,在实践中推动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因此,师道的建立非常重要,因为良好的师道可以传播正确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作为民众学习的榜样,通过教育也改变社会风气。

张栻是出自对湖湘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引发出自己的理解。“传道”是“济民”的基础,“济民”是“传道”

的目的，岳麓书院则作为“传道”的载体。张栻虽未专门著文以论述传道济民的思想，但其立体丰富系统的思想理论，寄予在他所留下的词文注释间。能透析出他对学士大夫们“忘实”的反思，主张的“修道立教”不仅出自于仁义之心，也是其知行合一的实践。张栻将教学与治国理安民相结合也体现出他对教化的重视。岳麓书院一直崇尚实学风气，张栻“传道济民”思想也是其影响之一。其“传道济民”思想中的仁为本、克己利民、立师道、学圣学治国理政等思想是对孔孟思想的传承，也在岳麓书院得到了发扬。

致谢

本文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重要讲话精神专项课题：《岳麓书院与传道济民》。项目编号：HDSY21001。

参考文献

- [1] 任仁仁/顾宏义著. 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M]. 中华书局. 2018. 01. 第6页.
- [2] (宋) 张栻撰; 邓洪波校点, 张栻集下 [M], 岳麓书社, 2017. 11, 第697页.
- [3] 向世陵 著. 善恶之上: 胡宏·性学·理学 [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 01. 第249页.
- [4] 郭焜.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J]. 哲学研究, 2022. 04: 54-64.
- [5] (宋) 张栻撰; 邓洪波校点, 张栻集下 [M], 岳麓书社, 2017. 11, 第763页.
- [6] 张天杰, 杨艳冰. 从“胡张”到“朱张”——以张栻为中心的湖湘学脉检视 [J]. 地域文化研究, 2023. No. 35 (02): 第13-27页.
- [7] 胡宏著. 《胡宏集》[M], 中华书局, 1987年版, 第131页
- [8] 朱汉民. 宋儒道统论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J]. 哲学研究, 2018 (10): 71-78+129.
- [9] 刘小勤. 湖湘学派的君主观探析 [J]. 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1 (06): 第25-31页.
- [10] 余英时.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M].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第6页
- [11] 乐爱国.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6 (04): 第21-26页.
- [12] 余英时.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M].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第165页.
- [13] (宋) 张栻撰; 邓洪波校点, 张栻集上 [M], 岳麓书社, 2017. 11, 第173页.
- [14] (宋) 张栻撰; 邓洪波校点, 张栻集下 [M], 岳麓书社, 2017. 11, 第617页.
- [15] 杨世文. 道不远人: 张栻的儒家之道 [J]. 船山学刊, 2022, No. 138 (02), 第56-68页.
- [16] (宋) 张栻撰; 邓洪波校点, 张栻集下 [M], 岳麓书社, 2017. 11, 第785页.
- [17] (宋) 张栻撰; 邓洪波校点, 张栻集下 [M], 岳麓书社, 2017. 11, 第790页.
- [18] (宋) 张栻撰; 邓洪波校点, 张栻集下 [M], 岳麓书社, 2017. 11, 第772页.
- [19] 余世英.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版. 第2页.
- [20] 余英时.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M].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第47页.
- [21] (宋) 张栻撰; 邓洪波校点, 张栻集下 [M], 岳麓书社, 2017. 11, 第792页
- [22] (宋) 朱熹撰;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 [M] 第24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12, 第4131页.
- [23] (元) 脱脱 等撰 《宋史》10卷 423-446 [M].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第3608页.